

SULIAN JUBIAN DE WENHUA TOUSHI

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 马龙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ULIAN JUBIAN DE WENHUA TOUSHI

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 马龙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马龙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4

ISBN 7-5004-5020-6

I. 苏… II. 马… III. 文化—研究—苏联
IV. G15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2844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连

责任校对 杨翠英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340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假权必究



马龙闪，1941年生，河南宜阳人。1967年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苏联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温州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理事。长期研究俄罗斯史，曾参加和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研究，发表专著、论文、译著等成果九十余种。主要代表作为专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自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苏联文化思想模式进行了全面研究，分析了它形成、确立、发展、演变和僵化的过程，它与苏联经济模式的密切联系，自身特征，以及它对于苏联剧变的影响。全书史料丰富，论证严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郭沂纹
封面设计：王华

目 录

总论：苏联剧变的思想文化根源透视	(1)
第一章 苏联早期的文化思潮和理论，文化斗争及其经验	
一 20 年代苏联文化思潮的演变：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	(39)
(一) “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	(40)
(二) “锻冶厂”——从“无产阶级文化派”过渡到“拉普”的中间桥梁	(65)
(三) “拉普”的发展和演变	(88)
(四) 斯大林与“拉普”	(130)
二 布哈林的无产阶级文化论与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	(132)
(一) 布哈林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	(133)
(二) 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布哈林所作的阐述	(138)
(三) 列宁和布哈林文化思想比较	(146)
三 列宁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153)
(一) 把文化建设视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	

2 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前提之一	(153)
(二) 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重视 克服“左”的倾向	(157)
(三) 审慎地领导了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	(160)
(四) 注意按文化事业的客观规律办事，实行对 文化的内行领导	(164)
四 布哈林与俄共(布)1925年文学政策的决议	(167)
(一)《决议》产生的背景	(167)
(二)布哈林对《决议》的贡献	(171)
(三)卢那察尔斯基的贡献	(183)
第二章 苏联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与文化体制	(187)
一 苏联二三十年代之交意识形态的“大转变”	(187)
(一) 20年代末期以前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方针 路线和它的社会科学状况	(188)
(二)意识形态领域“大转变”的动因	(193)
(三)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进程	(196)
(四)意识形态“大转变”的严重后果	(201)
二 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在“大转变”中形成	(203)
(一)苏联思想文化体制在意识形态“大转变”中 实现转型	(204)
(二)苏联思想文化体制转变的轨迹和特点	(211)
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与苏联思想理论的 僵化	(217)
一 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	(217)
(一)“大转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	(219)

(二) 30年代中后期：“大清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	(240)
二 30年代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	(254)
(一) “大转变”后的苏联社会科学	(254)
(二) 30年代的苏联文艺	(260)
三 苏联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	(261)
(一) 战后思想政治运动的缘起	(262)
(二) 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	(266)
(三) 战后的政治清洗运动	(278)
 第四章 后斯大林时期思想文化的曲折发展	(289)
一 “解冻”思潮的兴起和赫鲁晓夫时期思想文化政策的调整	(289)
(一) “解冻”思潮的兴起	(289)
(二) 赫鲁晓夫时期发展文化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297)
二 50—60年代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	(307)
(一) 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变化	(307)
(二) 苏联“解冻”后的文学艺术	(312)
三 赫鲁晓夫时期思想文化的曲折发展及其历史教训	(317)
(一) 思想文化发展的三起三落	(318)
(二) 思想文化和科学事业曲折发展的原因	(320)
(三) 思想文化和科学事业曲折发展的后果	(323)
四 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文化的停滞和倒退	(325)
(一) 向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的复归	(325)
(二) 僵化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335)

4 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三) 苏共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文化政策 的倒退	(338)
五 勃列日涅夫时期贻误科技革命及其严重后果	(347)
(一) 苏联对世界现代科技革命的反应	(347)
(二) 现代科技革命急迫地提上日程	(350)
(三) 停留在口头上的“科技革命”	(352)
(四) 贻误科技革命的有利机遇	(356)
(五) 贻误科技革命的原因	(358)

第五章 苏联文化体制的演化和文化意识形态管理的

历史教训	(366)
一 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 影响	(366)
(一) 意识形态在苏联的重要地位及其模式特征	(366)
(二)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起源和草创	(368)
(三)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集中化	(373)
(四) 书报检查权力由政府向党的机关的转移	(379)
(五) 苏联苛严书报检查制度的消极后果	(383)
二 苏联改革失败的深刻历史文化原因	(386)
三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历史的辩证的演化	(393)
(一) 我国学术界在苏联剧变原因上的分歧	(393)
(二) 从“斯大林现象”到“戈尔巴乔夫现象”是 历史的辩证的演化	(396)
(三) 有关苏联剧变根源出现歧见的原因	(407)
四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教训	(413)

总论：

苏联剧变的思想文化根源透视

苏联，这个横跨欧亚、威震宇内，曾同美国抗衡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世界一流大国，出乎人们预料，竟哗啦啦像被八级地震摧毁大厦般在历史的瞬间崩塌瓦解。世界上多少人为之惊愕，又有多少人为之叹息，叹息惊愕之余，人们不禁陷入沉思：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一超级地震的深层原因何在？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历史性课题，正像罗马帝国的兴亡一样，将被人们世世代代地研究下去。

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这场苏联剧变，其直接导因是戈尔巴乔夫以失败而告终的改革，而其基本原因则是苏联模式和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苏联剧变以来，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和失败，有关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模式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国内外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和言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和探讨。而有关苏联思想文化体制和模式问题对苏联剧变产生的影响，即从思想文化方面透视苏联的瓦解，人们却研究得相对薄弱，在这部专著中集中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

苏联思想文化模式有一个形成、确立、发展、演变和僵化的过程，它既同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有密切联系，又有自己本身

发展属性。如果说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模式在其形成之初，即 30—40 年代曾发生过积极影响，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有过一定推动作用的话，那么打着浓厚斯大林印记的苏联思想文化模式，从 30 年代形成、确立之日，除奠基于 20 年代的大科学体制和在 30 年代初整顿规范的教育制度对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影响外，在其他各个方面则有相当大的消极作用。

对苏联整个思想文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是由列宁奠基、布哈林具体阐释的 20 年代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这在俄共（布）中央 1925 年 6 月 18 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决议》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趋向缓和的总趋势作了正确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煽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① 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②。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是“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同资产阶级是“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对知识分子则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③ 此外，《决议》还对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包括党在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方面的领导权问题，文学艺术同政治无限复杂多样的关系、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多样性问题，关于团结“同路人”作家，“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关于主张各文艺团体、流派展开“自由竞赛”，反

^① 《“拉普”资料汇编》（张秋华、彭克巽等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18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3 页。

^③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 318 页。

对在文艺中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问题，等等，都作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规定。这是以布哈林为首的主管俄共（布）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以列宁思想为指针，总结 20 年代苏俄文化运动中同极“左”文化思潮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发挥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总方针和总路线，构成了苏联 20 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理论框架，标志着苏联 20 年代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原则和指导方针的形成。

但是，斯大林继反“右倾”斗争和政治经济“大转变”之后，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亲自领导并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抛弃了上述决议的指导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改变了发展思想文化的理论方针和政策。

在意识形态“大转变”中，斯大林号召向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在意识形态各领域全面“出击”，实行了同 20 年代截然不同的一条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路线和总方针，在一连串的大批判、大斗争中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思想文化模式。

斯大林之所以需要发动这样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主要是同布哈林这个非同寻常的理论对手进行斗争，全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需要决定的。与斯大林工作相处三十多年，十分了解斯大林意图和想法的莫洛托夫，在斯大林去世数十年后承认，同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是一场“十分困难”的斗争。^①这种困

^① 《莫洛托夫密谈录——与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6 页。

4 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难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经济学、哲学、国际政治和文化学说等方面卓有建树的“最大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观点几乎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所以，布哈林是斯大林最强大的理论对手；而且布哈林的理论哺育了十月革命后一整代革命者，他在苏联党和国家各个理论阵地都有自己的弟子和信奉者。最重要的是，列宁病重和逝世之后，他在理论上是布尔什维克党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的制定者，是党内对列宁思想领悟最深、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也是被列宁论定的“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要打倒布哈林，全面夺取并占领思想理论阵地，没有一场“全面进攻”，没有一场全局的“大转变”，是根本不可能的。斯大林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在反布哈林斗争刚一取得决定性胜负，便宣布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①当然，他在这里主要是指对布哈林“右倾集团”的胜利，是指全面转入超高速工业化，开始全盘农业集体化，即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大转变”。而意识形态的“大转变”，则发生在这一宣布之后。

事实上，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所作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就是对意识形态“大转变”进行的一次总动员。

斯大林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需要，二者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脱节”。^②这句话的实质是指，他当时在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处于劣势地位，阐释其“总路线”的“理论思想”赶不上需要，而布哈林在各个思想理论

^① 1929年11月3日，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阵地还有巨大影响。因此，他号召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予以“反击”。斯大林说：“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提法”。^①这实际上是要求思想理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反“右倾”斗争带来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转折。

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转变”，实际上是以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突破口。这样做是不奇怪的，因为布哈林首先是经济理论大家，搞臭并扫除他的经济思想是斯大林面临的当务之急。他以布哈林及其一派为靶子，归纳出国民经济成分“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小农经济“稳固”论和集体农庄道路等几大经济理论问题，对其肆意挞伐。《讲话》表面上气势汹汹，似乎用几个排比的反诘句就能把上述理论驳得体无完肤，事实上认真加以推敲，不难看出他在理论上的牵强附会、苍白无力和简单化倾向。

从斯大林《讲话》对其社会主义模式提供的理论思想中，我们只需指出两个最主要的错误：

1. 把批判矛头对准布哈林的“平衡”论，是否定国民经济需要平衡发展，为其不顾资金来源，实行工业化的超高速度，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提供论据。虽然斯大林在《讲话》中是以“平衡”论为口实，实际批判布哈林的“和平长入”论，但他突出的靶子是“平衡”论，这就为他的工业化模式提供了论据，开辟了道路。

2. 歪曲列宁的合作制思想，把列宁的合作社混同于集体农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7页。

6 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庄，把列宁主张的“合作化”混同于斯大林倡导的“集体化”。在不了解列宁晚年思想和 20 年代末党内斗争的人看来，列宁主张的“合作社”和斯大林提出的“集体农庄”，列宁的“合作化”同斯大林的“集体化”，似乎并没多少差别，充其量只是规模大小、速度快慢之差，实质上都是要发展农业集体经济。他们甚至认为，斯大林的“集体化”正是继承、发展了列宁的合作制思想。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发展合作社还是发展集体农庄，搞列宁的“合作化”还是搞斯大林的“集体化”，这是关系到工业化资金积累、工业化道路、工农联盟、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总体战略的一个绝大问题。斯大林借口 1923 年苏联还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说什么列宁当时“在他的《论合作制》一书中指出的是合作社的一切形式，既包括它的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也包括它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① 这是有意曲解和混淆。实际上，斯大林在这里是用了一个三段式论法来混淆这两种思想的：列宁的合作社 = 社会主义；同样，斯大林的集体农庄也 = 社会主义；因此，列宁的合作社 =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这样，就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变成了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计划，而且把集体农庄形式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农业社会主义形式。

这里需要说明，斯大林在作这个《讲话》前 6 天，即 12 月 21 日，刚刚举行了他自己的 50 诞辰盛大庆祝活动。在庆寿期间，《真理报》在前后长达一周的时间内，拨出大量版面报导各地、各方面的祝寿活动。并且发表了卡冈诺维奇的《斯大林与党》、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等不无失实和夸大之词的文章，进行歌功颂德。随着《真理报》和其他媒体的大规模宣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43 页。

传，“伟大领袖”、“英明导师”的头衔也随贺电、贺信从四面八方飞来，个人崇拜的气氛开始风靡全国。借助这种气氛，不经党中央讨论批准的斯大林言论已开始变为“金科玉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他对学术理论问题的表态和结论，已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更强大的法律效力和行政干涉力。这样，就把斯大林推上了偶像崇拜的地位，从而给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注入了更大的推动力。

正是继斯大林同布哈林发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大辩论，并在政治上、组织上战胜布哈林之后，在以斯大林 50 寿辰盛大庆典为标志，开始确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背景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超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理论，便以空前的强制力确立下来。

斯大林在以布哈林的经济理论为靶子做意识形态批判动员的这个讲话中，也以政治论断扼杀了经济学中“进化论”派和“目的论”派在经济计划方法问题上的学术争论。而在这个讲话不久，于 1930 年 2 月 9 日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问时，又对 1927—1929 年政治经济学中就该学科对象等一系列纯学术问题的论战作出结论，说什么，争论双方即以经济学教授鲁宾为代表的“唯心论”派和以亚·亚·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机械论”派，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他们的争论“当然是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① 这两派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派别，这样对他们一语论定，一概从政治上加以棒杀，这无疑就禁止了这场对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正常的学术争论。

伴随着斯大林的这一结论，在苏联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政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66 页。

8 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治经济学批判”。这场批判正方兴未艾之际，哲学界由刚毕业留校的马·米丁和在校学员弗·尤金，按照斯大林讲话的口径，在红色教授学院向著名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德波林及其学派发起批判，指责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哲学的党性原则，应对哲学战线理论“落后实际的状况”承担责任。

德波林学派是在 20 年代中后期同哲学界“机械论者”论争中成长壮大的一个哲学派别。该学派作为“辩证论者”，在这场争论中立足于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任务，推动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连米丁等人在他们发起批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承认，该派在同“机械论”的斗争中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德波林学派的缺点是带有若干经院气息，忽略一些现实问题的研究。米丁等人抓住这一把柄，对其大施挞伐。他们指责德波林及其学派不了解当前哲学战线“转变”的“全部实质”在于“把哲学问题‘政治化’和‘现实化’”。^① 在这里，实际上包含着对德波林学派的政治论罪。

米丁等人是刚出茅庐、有的甚至是尚未在红色教授学院结业的“哲学新兵”，其学术造诣和理论修养难为德波林学派的对手，况且其反德波林的真正论据也欠充足。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得到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支持。这清楚表明，实际上是有最高领导在做他们的后盾。

米丁等人受到上面支持后，更进一步把这场哲学争论向政治问题上拉，说什么，德波林学派不联系现实就是对“右倾”的态度问题，还攻击德波林贬低列宁，说他在政治上有“机会主

^① 《德波林学派资料汇编》（张念丰、郭燕顺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4—206 页。